

“弘扬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精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特别报道

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 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 梁柱

1944年9月5日，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不幸牺牲。毛泽东在中直机关举行的追悼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号召全党全军学习和发扬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为人民服务”这一高度的思想概括，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共产党人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扬并忠实践行这一光辉思想，对于我们党永远保持为民执政、永不脱离群众的革命品格和作风，增强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同以往的任何运动作了科学的区分，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所以具有这样的历史特点，能够担负起推翻旧世界，建设为绝大多数人所有的新社会，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认定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正因为这样，一方面，无产阶级失去了任何生产资料，是一个一无所有的阶级，对他们来说，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因而有很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正由于它们是大工业的产物，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能够组织起本阶级的力量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由上可见，为人民服务在价值取向上，正是体现了无产阶级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这一新的特点，也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

应当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有过“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群众服务”、“为人类服务”等提法，但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是毛泽东的一大贡献。如前所述，他在为悼念张思德而作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深刻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思想，明确地向全党、全体工作人员提出要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要求。1945年4月，他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出发点。取得全国政权后，为人民服务也就成为人民政权及其工作人员的根本宗旨。1957年3月，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员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智慧和他们的未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把自己的 人生价值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个人同群众的关系，密切地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1960年6月，毛泽东在郑州分别会见来自亚、非、拉地区的外国朋友。会见后，毛泽东在修改向晖起草的新闻稿时，先后把原稿中“中国人民伟大领袖”、外宾“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些话删去，熊向晖认为这都是外宾的原话，不理解主席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动。据熊向晖的回忆，他们之间有如下一段对话：

主席问：有什么不理解的？
我说：昨天写了非洲朋友“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敬爱”，这是他们的原话，主席把“中国人民伟大领袖”这几个字删掉了，说是“要不得”。今天写了拉丁美洲朋友“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也是他们的原话，也完全符合事实，我不理解主席为什么那样改。

主席说：人家那样讲，我们不能那么写。我们搞了这些年的建设，不能说没有成就，说“伟大成就”就不符合事实。“一穷二白”的面貌还没有改变，有什么“伟大”呀！
我说：成就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这符合事实吧？
主席说：为什么一定要说毛泽东的领导呀，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这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我把唯物史观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实践证明，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你不赞成？
我说：唯物史观并不否定杰出的领导人的作用。

主席说：这是半截子唯物史观。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也不能等量齐观。我讲了，今天你也写了，“人民是决定的因素”，领导人不应站在人民之上，不应站在人民之外，必须站在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总而言之，必须突出“决定的因素”，突出人民，决不要突出个人。
这个对话的深刻道理，是每一个共产党



员都应该牢记的，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强调，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的观点，首先是为工人和农民，他们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我们执政的基础。他们的状况如何，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关系极大。他认为，要依靠人民群众，首先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切实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他提出，“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他要求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要树立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这不但要以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体现群众的意愿，为群众谋利益，而且要把这种群众观点内化为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每一个干部都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以保证党的领导。毛泽东倡导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强调“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他说：“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又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的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察（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自己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在这里，他把“群众—领导—群众”、“个别—一般—个别”与“实践—认识—实践”完美地统一起来。这种反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都建立在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这一坚实的基础上。

因而，正确认识人民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及其所蕴含的伟大力量，正确对待和处理个人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前提和认识基础。

■ 全国胜利后党所处的执政地位，既为人民服务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能否始终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直接关系到党和人民政权的纯洁性及其性质，是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

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他预言：“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并且告诫全党，务必要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要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在这里，毛泽东高度警惕共产党自身的问题，清醒地认识到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古人有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这是自然界的兴衰规律，也反映了处在执政地位的党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毛泽东的这个预见和警告是及时的和深刻的，它实际上指明了党将长期面临着胜利后的执政的考验。

党取得执政地位后，能否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是毛泽东思考和忧虑的一个重大问题。当革命胜利的曙光初露端倪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要吸取“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的历史教训，他语重心长地说：“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包括我们党的经验时，总是把失败同骄傲联系起来，这是因为，骄傲就必然突出个人的作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样的话失政就是不可避免的；取得政权以后如果骄傲了，就会追求享乐腐化，骄侈淫逸。在中国，腐败与封建王朝如影随形，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王朝。民间有一个说法，“李闯王打天下十八年，坐江山十八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要求全党牢记李自成失败和我们党自身的历史教训，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会见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等，黄炎培提出中共能否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支配的问题，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后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还根据毛泽东提议规定了六条：一曰不做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这表明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把党执政后反腐败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

但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要防止腐化变质的警告，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即不幸而言中。进城之后，由于党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在部分党员干部中迅速滋长了居功骄傲，贪图享受，有的甚至走上了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犯罪道路。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深刻忧虑，认为这是一场早已料到的、不可避免的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与前途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决心通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有力地抵制资产阶级对党和人民政权的腐蚀。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是基于对“三反”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他要求全党要严重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

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他认定这“实是全党一件大事”，“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这场反腐败、反腐败的伟大斗争，是在毛泽东亲自倡议和领导下开展起来的。这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

上述表明，在执政条件下坚持党的根本宗旨，依然取决于能否继续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这是反腐败的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两党较量的实质，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争取人心的较量。蒋介石政权的阶级实质及其反人民的作为，起到了为渊驱鱼的作用，这正是这种貌似强大的敌人最终失败的深刻原因所在。我们要学会敬畏历史。敬畏历史，就是敬畏人民。国共两党的斗争，最终发生强弱易位，说到底就是人心较量的结果。人民最后就是用手推车来表决，碾碎了蒋家王朝，推出了一个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一切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毫无私利的政党，因而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同心同德，共同奋斗。如果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会失去一切。现在党在全国执政，意味着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不能不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下，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社会的公仆。这是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而提出的一个著名思想。这一思想已成为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工作人员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同任何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的一个显著区别。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对如何实践和发展巴黎公社原则进行了认真严肃的思考。他毕生为彻底实现和捍卫人民主权而奋斗，反复强调我们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早在延安时代他就引用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勉励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者，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要以鲁迅为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再要求党的干部要永远做人民的勤务员，他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才是一种高级趣味。他对那种仗势欺人，高高在上、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等官僚主义的恶习深恶痛绝，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要敢于挺身而出反对官僚主义。他不断对“摆老爷架子”，“摆官僚架子”和不顾群众死活的干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要求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指出，“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他一再告诫全党：“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

贵族阶层。”他极力反对并要求切实改变干群之间不平等的“猫鼠关系”。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指出了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在于脱离群众，要永远保持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要深刻认识水可以没有鱼，而鱼一旦离开了水，就失去了生存的起码条件。他提出要经过整风，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这些都深刻地说明，只有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密切联系群众，防止官僚主义作风对党的队伍的侵袭。

1956年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立之后，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认为，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改变还是不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企业管理人员和职工群众之间建立了互相合作的同志式关系。但是，这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有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作保证，否则，就有可能被损害和破坏，甚至严重的还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出现实际上存在的剥削和压迫的关系。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证，他说：“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这就是说，人民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上层建筑是不行的。只有劳动者的管理权得到保证，即能够以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才能使一切国家机关、部队、企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从而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的人民主权得到实现。

在毛泽东看来，官僚主义的实质是一种特权的思想和作风。这种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看作是个人的专利、专权，它不但会表现在漠视群众疾苦甚至欺压百姓的工作作风上，而且也会表现在以这种特权来谋取个人的私利。毛泽东极端憎恶特权的思想和作风，他是官僚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中国是一个经历了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有着深厚的官僚主义的思想和土壤。这种所谓“官国”传统，就是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思想，有官就有权，当官就可以作威作福，欺压鱼肉百姓，以至于官比法大，以权谋私。如果这种作风侵入我们党内，就会从根本上违背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党性原则，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毛泽东极端憎恶这种反人民的现象，他始终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彻底同“官国”传统决裂，为全党树立了人民公仆的光辉典范，是值得后世永远景仰和学习的。

当前，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在执政为民这一根本问题上，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许多尖锐问题。所以尖锐，因为它是在市场经济狂潮中出现的，使一些党员干部利令智昏，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不择手段地进行权钱交易，权钱勾结，暴敛国家财富，视群众如草芥，变成了榨取人民血汗的新的吸血鬼；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理想信念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出现的，使得这些问题具有群体性、延续性和疯狂性，增加了纠正的难度；由于我们工作等多方面的原因，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做到了，共同富裕却成了遥不可及的目标，邓小平晚年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指出这样发展下去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这表明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失去执政的最重要的群众基础。这一切说明，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当然，只要我们敢于面对现实，下大决心、大魄力，采取有效的措施，就会有信心解决好这些问题。党的十八大闭幕之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就以高昂而扎实的工作态度，有针对性地倡导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令人耳目一新。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大影响。会议庄严许诺：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并具体作出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是广大群众期盼已久的，有如清风拂面，沁人心肺。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优良传统的坚持和发扬，全党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这个良好的开局贯彻下去。

■ 如前所述，执政对我们党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是一场长期延续下去的“赶考”，“赶考”就存在被淘汰的危险；但我们又应当相信，中国共产党具有经受任何考验、包括克服自身错误的内在力量。